

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

葛腾飞

摘 要 2003 年美国以武力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人的反美斗争与伊内部各派系间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伊拉克迅即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失序困境。为了实现自身战略利益,达到打造一个亲美、民主、稳定的伊拉克的政治目的,美国重新拾起“反叛乱”战略工具,希望在伊拉克赢得民心并有效地进行国家重建。为此美国在伊拉克实施了一系列“反叛乱”行动项目,包括在伊拉克战争后期的“增兵”战略。不过,由于伊拉克政治局势异常复杂,美国在界定“反叛乱”战略目标上过分树敌,以及美国战略决策层在伊拉克战争中主导性的低成本理念与“反叛乱”行动对资源和投入长期而极大的需求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略实施的长远成效较为有限。

关键词 美国 伊拉克战争 “叛乱” “反叛乱” 战略

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国以臆造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正式发动了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军事打击。到 4 月 15 日,美国便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阶段结束。然而,美国为应付其在伊拉克制造的混乱局势而不得不在伊拉克陷入了一场“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战争。经典的“反叛乱”战略理论再次付诸伊拉克战场。然而,经历了信息化转型和遭遇严重财政困窘的美国军队,无法成功地实施成本高昂的“反叛乱”战争。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遭遇的“叛乱”(insurgency)和“反叛乱”困境,来分析其战略的成败及其发展趋向。

一、美国的经典“反叛乱”战略

“叛乱”与“反叛乱”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范畴而存在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

* 葛腾飞,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南京 210039)。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叛乱”和“反叛乱”是一对本质上相对立的政治运动,除非附加特定的政治内涵,否则“叛乱”和“反叛乱”本身并不应包含固定的法律和道德含义。经典“反叛乱”理论家大卫·加鲁拉认为,“叛乱”并不像普通战争那样,是“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继续”,而是“国内某政党对政治以任何方式的追求”。在他看来,“反叛乱”与“叛乱”是同一冲突的两个不同方面,两者在语义学上可统称为“革命战争”。^①加鲁拉的界定清晰地反映了二战后“叛乱”与“反叛乱”出现的时代背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亚非拉第三世界出现了旨在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由于担心这种反西方运动与情绪提升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进而挤压西方阵营的影响,美国开始关注在第三世界蔓延的颠覆性“叛乱”活动,并在对外干涉中运用“反叛乱”战略。^②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陆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等军事顾问帮助菲律宾成功镇压了“胡克”运动,并在菲律宾扶持亲美反共的马格赛赛上台,稳定了菲律宾政局。此后6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大规模地运用“反叛乱”战略。1962年1月,肯尼迪政府成立了最高级别的协调委员会——“反叛乱”特别小组,并形成了美国最早的“反叛乱”战略纲领性文件《美国海外内部防务政策》,在越南实施了一系列“反叛乱”行动,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准军事、民事等各种策略手段,对越南南部的越共和民族解放阵线力量进行综合性打击,尽管此举并没有达到其预想的政治军事结果。其间美国学界和战略界也对“反叛乱”行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经典的“反叛乱”战略理论。后经80年代“低强度冲突”干涉时期以及冷战后的发展,经典“反叛乱”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强调民众。平民人口是每次“叛乱”的重心。若不能赢得全体民众的支持,就不能有效地打击“叛乱”。理论上,“反叛乱”战略要求在民众和“叛乱”者之间打入楔子。第二,强调运用综合性的战略以应对民怨。成功的“反叛乱”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战略,将军队、警察行动与社会、政治和经济行动相结合。因为“叛乱”源于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因此必须找到有效处理激发“叛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手段。第三,强调各政府机构间的协调。政府需要通过一致性的努力,在各个层面上,在军队和平民机构之间进行密切协商。第四,强调情报。若要对常常生活在普通民众之中并从中取得支持的“叛乱”者进行有效打击,需要有效情报。缺乏有效情报的军队和警察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白费努力。第五,强调宣传。政府需要发动一场有效的宣传战,以消除全体民众的恐惧,同时破坏对“叛乱”分子的支持。第六,注重力量使用的策略。周密部署军队和警察力量的

^① David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4, p. 1. 大卫·加鲁拉(1919—1967)法国人,军事阅历极其丰富。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经受法国政府委派在中国、希腊、阿尔及利亚等多地有军事任职。1962年春以实习研究员身份加入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后在美国从事关于“反叛乱”战争方面的研究。

^② 参见葛腾飞、苏昕《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使用,两者还要有所区别。过于强制的方法徒劳无益,并在民众中滋生不满。^①

美国在一系列对外干涉的“反叛乱”行动中,形成了较有体系的“反叛乱”战略。其精髓是:运用政治、经济、安全、民事等多方面的手段,服务于民生,保护民众免于“叛乱分子”的暴力,从而赢取民众的忠诚与支持,达到最终瓦解“叛乱”的效果。具体来说,“反叛乱”战略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方面:

一是政治。基于政治属性是“叛乱”与“反叛乱”战略的首要政治属性,政治战略是整个“反叛乱”战略的核心内容。一般而言,“反叛乱”战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政治战略。如果政治战略过于模糊或不现实,或者缺少国内国际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那么“反叛乱”行动就不太可能成功,即使其他战略要素已有成效。^② 政治战略的重点在于强化政府执政能力以及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民生民权问题。因此,面临“叛乱”问题的政府必须实行某种程度的政治“行为修正”,^③其中具体包括政治改革、反腐败、改善吏治、和平谈判、分化融合“叛乱分子”等。

二是安全。安全战略是整个“反叛乱”战略的基础内容。一般而言,政府的安全力量主要包括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其目的是为其他政治、经济、文化部门的运作提供安全环境与人身保护。安全战略一方面是指政府向民众提供人身安全保护,使之免于“叛乱”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则是指武装镇压“叛乱”活动,消灭“叛乱”分子的有生力量。前者主要强调维持法制秩序、保持正常经济秩序与生活秩序、保护基础设施安全等。后者则强调对“叛乱”分子的精确打击,以避免大规模军事行动给平民造成的伤亡。其战术一般是“清除—控制—建设”,而非“搜寻—破坏—毁灭”。

三是经济。“反叛乱”的经济战略主要包括短期援助战略与长期发展战略。短期援助主要是政府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与基本生活服务(如安全用水、卫生系统、健康医疗、基础教育等),而长期发展战略则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持农业、工业、教育、医学及商业活动。短期援助重在达到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展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以赢得民众支持;长期发展则旨在显示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并最终解决“叛乱”问题的能力,给民众留下某种期待。有效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抚平社会

① James S. Corum, *Fighting the War on Terror: A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07, pp. 27—28. See also David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David Galula, *Pacification in Algeria 1956—1958*, RAND, 1963; Sir Robert Thompson, *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6; Thompson, *No Exit From Vietna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9; John J. McCuen, *The Art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Wa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6; Edward Lansdale, *In the Midst of Wars: An American's Mission to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1; Douglas Blaufarb, *The Counterinsurgency Era: U. S. Doctrin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② U. S Government, *Counterinsurgency Guide*, January 2009, [www. state. gov/t/pm/ppa/pmppt](http://www.state.gov/t/pm/ppa/pmppt), 2012-11-10, p. 23.

③ *Ibid.*

内部的不满与抱怨情绪,使“叛乱”分子失去民众支持。^①

四是信息。“反叛乱”战略要求做到信息资源集中。在“反叛乱”行动中,信息渠道的畅通是其他所有战略要素得以成功的保证。信息通常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政府为了解情况、正确决策而渴望得到的“知识性信息”,此为“情报”;另一种是政府为影响民众而主动散布的“影响性信息”,此为“舆论”。情报包括对手的活动信息、社会背景知识、民众文化知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舆论主要是对特定群体的民意引导,其方式一般是媒体宣传,推出更能吸引民众的反宣口号,如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平发展等,现在也强调通过政府官员、安全部队与民众之间的日常频繁接触来产生更为直接、更具说服力的影响。^②

二、伊拉克的“叛乱”与“反叛乱”解析

伊拉克的所谓“叛乱”形势原本并不存在,而是美国通过武力干预造成的。按照加鲁拉所说的“叛乱”和“反叛乱”的政治属性来理解,姑且不说美国对伊武力干预的不合法性,美国自从决定对伊拉克进行武力干预开始,其实就注定成为伊拉克所谓“叛乱”活动的目标指向。美国选定伊拉克进行武力干预有它明确的政治含义,即铲除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将伊拉克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按美国“反叛乱”专家詹姆斯·科拉姆所说,如果中东地区要选一个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话,伊拉克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③美国期待将伊拉克打造为阿拉伯国家一个非集权的政治模型来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动力,证明民主的效力,改善波斯湾地区的政治环境,并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的一个根据地,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帮助美国。^④如乔治·W·布什总统所说“在中东的心脏地区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决定性地击败独裁和恐怖力量。”^⑤

美国决策者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武力入侵实现对伊拉克旧秩序的“颠覆”,不

① K. Cragin and P. Chalk, *Terrorism and Development: Us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nhibit A Resurgence of Terrorism*, Rand, 2003, pp. X—XI.

② See Martin C. Libicki, et al., *Byting Back: Regaining Information Superiority against 21st-Century Insurgents*, Rand, 2007.

③ 伊拉克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以及庞大的总体上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还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伊拉克是最世俗的阿拉伯国家之一,更激进的伊斯兰势力也没有在这里取得控制。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派系关系传统上也比较和睦,相互通婚普遍,一些部落既包括逊尼派,也包括什叶派。伊拉克还是中东地区对基督教少数派最宽容的国家之一,基督教少数派约占人口5%。伊拉克经济比中东其他富油国家也要健康得多,相当多元化,轻工业和重工业均较发达。还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并出口粮食。James S. Corum, *Bad Strategies: How Major Powers Fail in Counterinsurgency*,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08, p. 182.

④ James S. Corum, *Bad Strategies*, p. 181.

⑤ President discusses war on terror at Fort Hood, 12 April 2005. Quoted from Andrew Rathmell, “Planning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Iraq: What Can We Lear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1, No. 5, 2005, pp. 1013—1038.

仅满足了自身的战略利益,而且美国军队作为伊拉克的“解放者”将会受到伊拉克民众的热烈欢迎。伊拉克人民很快将热情地拥抱“民主”,并有效地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因此更好地得到保障。然而,结果完全出乎美国所料,伊拉克人将美国视为占领者和侵略者。美国这一外来“革命者”无法为伊拉克建立有效的法治秩序,伊拉克陷入了空前混乱之中。^①令伊拉克形势更加复杂化的是,联军临时权力机构(CPA)^②负责人布雷默大使上任后,宣布遣散拥有 200 万成员的伊拉克复兴党并禁止复兴党高层人士担任新政府管理职位,解散伊拉克 385,000 人的军队和 335,000 人的安全部队(包括警察、总统安全卫队以及其他国内安全部队)。因丧失权力和工作,相应的工资收入被剥夺,被解散的这些旧政权力量直接成为新的反美力量的核心来源。

从结构层面上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的伊拉克混乱局势反映了伊拉克旧专制政治机器被打碎后的一种社会政治重构过程。把伊拉克看做一个社会政治空间,当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在美国重建与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以及随后的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均未提供有效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情况下,伊拉克这个长期受到高度禁錮的社会政治空间突然陷入了一片混沌的初始状态。各种社会政治角色面临着重建和重构的任务,均在没有法治和有效管控的情况下,试图争夺和确立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这自然激发出各种社会基层力量的重新组合和竞相斗争。在萨达姆时期受到专权压制的民众力量和教派冲突也一下子爆发出来。

本来,这些参与伊拉克社会政治重构的各种力量不应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叛乱”,虽然它们属于社会政治力量在受到长期压抑后突然出现的反弹和生长,但它们完全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相互适应和自适应后,共同促成伊拉克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秩序的生成与确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强权作为一种外力既在一开始打破了伊拉克的社会政治平衡,又作为一种持续的外力存在而阻碍了伊拉克新的社会政治平衡的出现。美国以强权推翻了伊拉克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强行引入了一种社会政治的重构过程,但却没有对这一社会政治重构按符合伊拉克社会政治自身逻辑的方法来进行公正有效的规范,也没有赋予伊拉克完全自主性的路径。美国一手主导的伊拉克社会政治重构,其实是从美国的政治意图出发,或者说是按照美国为了自身政治目标而打造的美国式规则来进行的,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要确保听从美国的伊拉克社会政治力量的上升和掌权。凡是不利于美国政治目标实

^① 对于大规模战争后的重建,2003 年 1 月底,拉姆斯菲尔德任命退役中将杰伊·加纳(Jay Garner)领衔成立了重建与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RHA)。但在国防部宣布建立该机构到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间,加纳仅有 61 天的时间去筹建,同时还要形成一个跨机构性的伊拉克战后重建计划,与中央司令部以及尚未确定人选的伊拉克战后军事指挥部司令等进行协调,这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John Ehrenberg, et al., eds., *The Iraq Pap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80.

^② 2003 年 5 月,重建与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被联军临时权力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所替代,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大使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特使,担任负责伊战后政治和经济重建工作的最高文职行政长官。

现的力量,均遭到美国的政治压制、排挤和军事打压。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美国阻击而难以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也就纷纷以反美或反对新政治权威力量的不同形式出现。这些反美或反对伊拉克新政治权威的力量在得到有效的领导之后,又与原先伊拉克各派系内部历史性的相互争斗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各种形式的、复杂的政治斗争画面。

面对这种情势,驻伊美军不是致力于理清伊拉克的社会政治秩序,而是试图将美国无法控制的各种力量一概纳入“叛乱”之列。2006年出台的美国陆军野战条令将“叛乱”界定为“有组织的、持久的政治军事斗争,意在削弱现行政府、占领国或政治权威的控制力与合法性”。^①依据这一定义,美国将伊拉克新的社会政治重构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反抗美国或美国支持的新政治权威的斗争,都划入“叛乱”的范畴,以此作为其“反叛乱”战略的基本指向。显然,美国的这一“叛乱”界定和以此为依据的“反叛乱”战略犯了过分树敌的失误,它实际上将自己放到了大部分伊拉克人的对立面。

伊拉克的社会政治力量涉及三个主要派别,一是在萨达姆时期占统治地位但如今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逊尼派,二是现在处于主导地位的多数派什叶派,三是更忠诚于本民族的库尔德人。逊尼派按照不同的街区、武装组织、部落、家族等等复杂的关系形成各种不同的组织。什叶派也形成若干具有不同议程的竞争性派别。另外,还有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外国战士。按照是否有利于美国在伊拉克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基本标准,在重建伊拉克新社会政治结构的过程中,美国认为,原在萨达姆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逊尼派、什叶派中反美倾向浓重的派别,以及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其他反美力量,是构成所谓伊拉克“叛乱”的主要力量源泉。而这些人又可划分为分离主义者、逊尼派“叛乱”分子、极端恐怖分子、什叶派武装组织以及犯罪分子等众多不同的成分。其主要成分有三:

一是反对伊拉克政府和美军占领的逊尼派“叛乱”分子。美国的伊拉克民主计划指望将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叶派置于最强有力的政治地位。被流放的什叶派领导人在新建立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一个临时性顾问机构)中扮演的巨大作用,旧的伊拉克军队的解散(逊尼派曾在其中担任大多数军官职务),以及禁止复兴党成员进入政府工作(去复兴党化),这些都加剧了逊尼派被边缘化的情感。就在布雷默宣布解散伊拉克旧军队与安全部队的命令之后四天,第一起“叛乱”者的炸弹就在逊尼派和复兴党根据地法鲁贾爆炸。“叛乱”者还开始袭击那些与联军合作以建立新政

^① Department of the Army, FM3-24, Counterinsurgency,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6, p. 1-4. 显然,这一条令根据伊拉克战争等美国面临的新形势对“叛乱”的概念进行了新的修订。1962年肯尼迪政府在《海外内部防务政策》中将“叛乱”界定为“针对合法政府的反抗或暴动但还达不到内战状态的一种情势”;1990年美国陆军和空军联合发布的关于低强度冲突的野战条令(FM 100-20/AFP 3-20)中,“叛乱”被界定为“通过革命接管或取代现行政府而掌握政权的有组织武装政治斗争”。2006年《反叛乱》条令对“叛乱”的界定在内涵上进行了延伸,“叛乱”不仅仅针对本国现行政府,还包括针对“占领国”的反抗。参见葛腾飞、苏昕《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府的伊拉克人。2003 年夏,逊尼派出现了至少 8 个致力于与美国人和什叶派进行战斗的组织。2004 年 4 月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对费卢杰的进攻更激起了逊尼派广泛的愤怒。^① 总体上说,这些“叛乱”势力旨在抵制美国的占领,破坏美国支持的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临时政府。基于逊尼派民众持有的这种普遍的反美和反对伊拉克新政治权威的情绪,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一开始的最主要目标便是针对这些广泛不满的逊尼派。从另一方面说,逊尼派的政治倾向对美国在伊拉克战略的成败也颇具影响。事实上,后期西部逊尼派部落出现“安巴尔觉醒”并影响伊拉克全国,对于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略取得成效意义重大。

二是极端恐怖分子。美军入侵伊拉克后,许多外国伊斯兰极端组织进入伊拉克。阿布·穆萨布·扎卡维领导的极端主义伊斯兰组织“统一圣战”对驻伊联军以及与联军合作的伊拉克政府官员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2004 年 10 月,扎卡维公开宣布效忠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因此扎卡维的极端组织后被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② 2006 年 1 月,伊拉克基地组织联合伊拉克境内其他圣战组织,成立了“圣战舒拉委员会”,并于 10 月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拉克基地组织得到了外国战士的拥护,他们声称自己的目标是进行“圣战”,推翻伊拉克新政权,建立一个实施伊斯兰法的伊拉克国家。除了伊拉克基地组织,伊拉克还存在其他一些逊尼派圣战组织。^③ 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通过叙利亚、伊朗与伊拉克边界轻易地进入伊拉克。这些极端分子实施自杀式袭击等恐怖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在 2004 年初以后,人群密集区域出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成为伊拉克“叛乱”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极端恐怖分子是美军在伊拉克“反叛乱”行动后期的主要目标。

三是什叶派反美武装。随着“叛乱”活动的开始,什叶派开始组织其政治党派并组建民兵组织,一开始仅仅是保护其所在的街区。伊拉克的无序局面使美军起初容忍了伊拉克民兵武装组织在后萨达姆时期的兴起。2004 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还在国会指出,美国能够接受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作为应对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的一种辅助手段。^④ 这些民兵组织武装比新组建和训练的伊拉克警察部队得到更好的领导、训练和组织。仓促训练和组织的伊拉克新安全部队在大部分地

①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这次进攻中使用了炮兵、坦克和空中轰炸等传统作战方式,造成了大批逊尼派平民的伤亡。逊尼派将这看成是对其社会的一种攻击,纷纷从其他逊尼派城市涌入费卢杰,“叛乱”在逊尼派民众中间得到了普遍支持。这迫使美军以及伊拉克临时政府于 4 月底结束了第一次费卢杰战役并撤出该地。

② 扎卡维 2006 年 6 月被美军空袭炸死。

③ “Active Groups: Iraq”, *Jane's World Insurgency and Terrorism*, Issue 34, 2011, p. 737.

④ Anthony Schwarz, “Iraq's Militias: The True Threat to Coalition Success in Iraq”, *Parameters*, Vol. 37, No. 1, Spring 2007, pp. 55—71.

区不得不接受这些民兵组织的权力。^① 随着逊尼派暴力活动的蔓延,什叶派民兵组织也日益军事化。其中,巴格达萨德尔城的穆克他达·萨德尔领导的武装组织“马赫迪军”是唯一与美军展开正面军事对抗的什叶派势力,这支武装拥有200万什叶派成员,他们由伊拉克贫穷、年轻的什叶派男性组成,倡导伊斯兰主义、马赫迪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反美主义以及平民主义。^② 2004年4月和8月,萨德尔的马赫迪军两次与美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迫使后者和临时政府承认萨德尔运动的政治地位。在什叶派宗教领袖阿里·西斯塔尼的调解下,2005年底萨德尔运动加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参加伊拉克政府,成为伊拉克国内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力量。2007年4月由于不满马利基政府和美国政策,萨德尔派退出伊拉克政府,9月退出伊拉克团结联盟,并与巴德尔旅以及伊拉克政府军发生军事冲突。萨德尔2007年8月宣布暂停军事活动被认为是伊拉克暴力活动减少的重要原因。由于以马赫迪军为代表的伊拉克什叶派反美武装持有根深蒂固的反美主义倾向,因此成为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略要对付的第三个重要对象。

三、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

面对伊拉克“主要战斗阶段”结束后的混乱局面,美国政府和军队开始强调以“反叛乱”行动模式来应对伊拉克的困境,并希望以此摒除“全球反恐战争”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2004年美国陆军颁布《反叛乱行动》临时野战条令(FMI 3-07.22)。同年,参联会颁布《海外内部防务的联合战术、技术及步骤》。2006年6月,海军陆战队出台《小单位指挥员反叛乱指南》。12月,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颁布《反叛乱》野战条令(FM 3-24/MCWP 3-33.5)。条令对新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进行了明确的概念界定:“叛乱”是指“有组织的、持久的政治军事斗争,意在削弱现行政府、占领国或政治权威的控制力与合法性”;“反叛乱”则是指“政府为挫败叛乱而采取的军事、准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及民事行动”。条令声称,“当今的作战环境包括一种新式叛乱,其目的在于追求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性剧变”。条令在回顾经典“反叛乱”理论的历史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重点针对民众展开行

^① 在许多地方,当地招募和训练的伊拉克国民警察只是伊拉克最强大的地方武装之一。正如时任美军参联会主席的理查德·迈尔斯将军所说,“这些当地人不愿意与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作战。”萨德尔的马赫迪军仍是这个国家最大、最有效的军队之一。其他什叶派武装还包括伊拉克真主党、达瓦党武装,以及伊朗人训练的民兵武装力量。每一支民兵武装都会与伊拉克的一个政党联合,因此2005年进行选举并组成议会,各政党民兵组织便从其后台政党那里得到政治保护。支持萨德尔的政党在议会控制了30个议席,虚弱的伊拉克政府根本不可能对萨德尔的马赫迪军采取行动。政党成功地阻止立法和改革,即使其武装组织实施教派清洗行动,伊拉克政府也无力采取行动。See Ahmed Hashim,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0—122, 197.

^② 李福泉《伊拉克萨德尔运动探微》,《西亚非洲》2010年第6期,第36—40页。

动并通过民众获取“叛乱”分子信息、适当使用武力并根据“叛乱”分子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支持所在国政府和加强当地政权建设等原则。^①在新的“反叛乱”战略指导下,美国对在伊拉克的行动进行了新的规划,旨在从多方面采取系统行动,以化解伊拉克的战略困境。

一是美军自身围绕“反叛乱”战略实施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培训。2006 年至 2007 年间,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军“反叛乱”专家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在担任利文沃斯堡的美国陆军联合中心负责人时,大力推进对“反叛乱”理论的研究,并领导制定了新的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反叛乱》联合野战条令,依据“反叛乱”原则对美军如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给予指导。在美国国内,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对他们的部队训练项目进行了更新。海军陆战队在加利福尼亚的廿九棕榈镇(Twenty-nine Palm)的“诸军兵种联合演习项目”以及加州厄尔温堡美国陆军全国训练中心均将训练重点从对付苏式常规对手变成对付“叛乱”。驻伊联军指挥官乔治·凯西将军还在塔济(巴格达北部)建立了反叛乱学院,美国所有驻伊拉克的营、团指挥官们都必须在这里进行为期 8 天的学习。同时凯西本人还到每个师和旅介绍他的战略观。^②

二是加快重建和训练伊拉克人自己的安全部队。20 世纪 60 年代美军“反叛乱”战略的纲领性文件《美国海外内部防务政策》便特别强调,“叛乱”与“反叛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美军如过多参与,反而会产生反作用,使得当地“叛乱”者可以通过“反抗侵略、独立自主”来赢得民众支持和政治优势,并将美国支持的政权当成“傀儡政权”来予以打击。有鉴于此,美国必须尽快帮助建立伊拉克人自己胜任的安全部队来替代美军的直接作战角色,使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化”。重建和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因此成为美军“反叛乱”战略实施的重要任务之一。自 2004 年年中开始,美国开始强调尽快建立伊拉克安全部队。6 月,前 101 空中突击师师长、刚刚晋升陆军中将的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被任命领导新成立的伊拉克多国安全过渡期指挥部。该指挥部是驻伊联军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发展、组织、训练、装备和维持伊拉克安全部门(包括伊拉克国防部和内政部)及其附属伊拉克安全部队,包括伊拉克军队和警察。其任务一开始分成三大部分,由三大机构行使:一是联军军事援助训练组,负责组织、训练和装备伊拉克陆军;二是联合司令部顾问支持组,任务是支持伊拉克军队联合司令部形成一个指挥和控制体系,还承担在军事行动计划中提供帮助以及向伊拉克政府提供战略性建议的任务;三是民用警察援助训练组,任务为组织、训练和装备伊拉克警察部队。后来,多国安全过渡期指挥部又从原先的三大机构和职能逐步扩大,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任务,包括帮助伊拉克组建

① Headquarters of Department of the Army, FM 3-24, *Counterinsurgency*, 2006, pp. 1—4.

② Daniel Marston and Carter Malkasian, eds., *Counterinsurgency in Modern Warfare*,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8, pp. 252—253.

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各种伊拉克警察机构,以及军事和警察情报组织等等。

2004年7月上任的驻伊联军指挥官乔治·凯西将军(接替里卡多·桑切斯将军)也强调要加速伊拉克新军的建设。^①为了加速伊拉克陆军的发展,凯西还建立了“过渡期小组”项目,即将10名到12名美军顾问安插到每个伊拉克陆军的师、旅和营。另外,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营也与伊拉克营(大约500名战士)一起合伙行动和巡逻。^②到2007年9月,过渡期指挥部训练与装备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主要包括军队、国家护卫队与警察)已经超过16万,这使得伊拉克的士兵总数约至13.1万,警察总数约至13.4万。^③除了规模的扩大,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装备也得到明显的改进。自动步枪、机关枪、装甲车等美式装备使其战斗力大大提升。然而,伊安全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参差不齐,仅小部分可独立行动,大部分必须与美军协同作战。

三是着力于伊拉克当地政权建设,按步骤进行伊拉克政治重建,加快扶植成立伊拉克中央政府。政治战略在“反叛乱”战争中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一旦军事形势趋稳而具备起码的条件,建立有效的当地“反叛乱”政权并加强其控制局面的能力,提高该政权的合法性,这便是“反叛乱”战略实施的关键任务。早在2003年7月,驻伊联军就曾成立过由25人组成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2004年6月28日,根据之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在形式上将主权从伊拉克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移交至伊拉克人手中,建立了以伊亚德·阿拉维为总理的伊拉克临时政府。根据《过渡期行政管理法》,伊拉克在2005年进行了三次选举。1月30日,伊拉克“临时国民大会”经选举成立。10月15日,伊拉克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草案。12月15日,伊拉克举行伊拉克战争后首次正式议会选举。虽然选举委员会号称约1000万选民参与投票,投票率高达70%,但其宗派色彩与种族色彩似乎更令人侧目。根据选举公布结果,什叶派政党“伊拉克团结联盟”、“库尔德人联盟”、逊尼派政党“伊拉克和谐阵线”成为伊拉克国民议会三大主要政党。^④由于各派之间围绕政府的人事安排斗争激烈,伊拉克政府内阁直到2006年6月9日才最终成立,并由马利基出任内阁总理。虽然伊拉克新政府人员组成的宗派色彩依旧浓厚,但伊拉克从过渡国民议会选举、组成过渡政府、宪法草案全民公决、国民议会选举,再到新政府的成立,美国为伊设计的政治重建战略在形式上初见成果。

四是针对当地民众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民事措施,保护民众安全,获取有效信息

① 2004年末,乔治·凯西将军对他的战役计划进行了一次评估。这次评估在反叛乱专家卡列夫·塞普的指导下,得出结论认为伊拉克陆军的组建需要加速。Kalev I. Sepp, “Best Practices in Counterinsurgency”, *Military Review*, October 2006, pp. 8—12.

② Daniel Marston and Carter Malkasian, eds., *Counterinsurgency in Modern Warfare*, p. 252.

③ Thomas R. Mockaitis, *Iraq and the Challenge of Counterinsurgency*,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8, p. 134.

④ Bruce R. Pirmie and Edward O’Connell,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2003—2006)*, Rand, 2008, p. 14.

并促进伊拉克重建。《反叛乱》野战条令强调,要将经济重建等有力措施与对锁定的暴力行为者目标的打击结合起来,重点影响“人的因素”,如提升当地人口对“叛乱”活动的免疫性。^①“反叛乱”所强调的“人的因素”的首要含义,便是赢得民众的支持,确保民众的安全。在镇压“叛乱”过程中争取得到当地民众的默许和积极支持,并由此赢得其拥护。在伊拉克美军中担任顾问的美国反叛乱专家卡列夫·塞普认为,所有的民事和军事计划与行动的焦点,即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都必须是任何冲突解决的重心。赢得人心,必须成为政府努力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政策目标,它必须被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所掌控。^②

彼得雷乌斯在 2007 年担任驻伊联军司令后,强调最优先任务便是保卫伊拉克民众。在他看来,美国政府在 2007—2008 年间实施的对伊拉克增兵战略^③,其要义便是在当地暴力频仍的环境中,通过增加兵力,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和平政治空间,重点保护民众的安全。彼得雷乌斯在 2007 年 3 月 19 日给他的部队写道“提升伊拉克全体居民的安全……是你们战略的压倒一切的目的。完成这一使命,需要执行复杂的军事行动,并使伊拉克民众确信,我们不会仅仅是‘肃清’敌人的街区,我们还将留守下来,帮助他们‘守住’这些街区,以使他们社会中许多地方的‘建设’阶段能够向前推进。”^④驻伊美军与伊拉克军警开始在伊全国各地共同巡逻,共同设立联合安全检查站,共同构筑联合防御工事,阻止恐怖分子与“叛乱”分子的武装袭击。彼得雷乌斯不像以前那样强调修建大型坚固要塞,转而建设更小型的、更分散的基地,步行巡逻,并直接为伊拉克民众提供安全保证。更为重要的是,美军开始努力寻求与逊尼派武装部落及什叶派游击队达成停火协议,以此推动伊拉克战后和解进程,此举与逊尼派部落出现的“安巴尔觉醒”一起,确保了增兵战略取得实效。

美军还强调民事活动在伊拉克国家重建中的重要价值。早在 2004 年,美军专门在特种司令部成立“民事营”,其任务便是“加强军队与驻地政府的军民关系,协调政府管辖区内的军民联合行动,以此赢取伊拉克人民的信任与尊重”。民事营与伊拉克人同吃同住,为之提供安全保护与重建援助。刚进驻时,民事营护送一批批医疗设备与食物,前往当地医院并协助进行分配。尔后,民事营则驻扎在当地,为之提供输电、送水、铺路等基础服务。^⑤此外,驻伊美军还效仿驻阿富汗联军的做法,于 2005 年 11 月成立了首个伊拉克省级重建小组。其成员包括国务院外交官、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工作人员、农业专家以及工程师,集中在各省提供经济援助。该小组很快在省级地方政府战后重建的扶助工作中发挥了出色作用。在伊拉克军队的帮助下,美军

①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FM 3-24/MCWP 3-33.5, *Counterinsurgency*, December 2006, p. 3-2.

② Kalev I. Sepp, “Best Practices in Counterinsurgency”, pp. 8—12.

③ 小布什总统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宣布了他的“增兵”新战略,另派 2 万到 2.5 万人部队来加强在伊拉克的 14 万名美国人员,使驻伊美军总数激增至 17 万,同时还将省级重建小组的规模扩大一倍。为实施增兵战略,布什以彼得雷乌斯取代凯西出任驻伊联军司令。

④ Daniel Marston and Carter Malkasian, eds., *Counterinsurgency in Modern Warfare*, p. 258.

⑤ Thomas R. Mockaitis, *Iraq and the Challenge of Counterinsurgency*, p. 129.

还将注意力转向保护伊拉克边界安全,广泛接触当地民众以搜集情报,采纳“清除—控制—建设”的方法,以期彻底阻止外国战士流入伊拉克。

四、对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略的评估

美国在伊拉克展开的“反叛乱”战略到底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美国想要的结果呢?衡量这一战略实施效果的表面依据是伊拉克的安全状况是否改善。从长远来看,伊拉克法治和秩序是否有效恢复,自主性重建进程是否有效开始,则是衡量战略成功与否的实质性重要参数。

一般而言,驻伊拉克美军和伊拉克平民的伤亡人数被用作衡量伊拉克安全状况变化情况的基本参考。由此来看,2007年后驻伊美军与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均出现了明显下降。图-1 系驻伊美军死亡人数:^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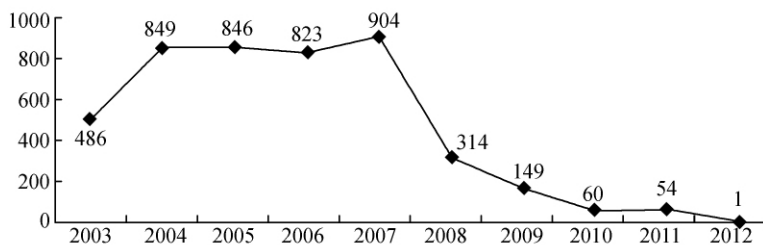


图-1 驻伊美军死亡人数变化(人/年)

总部位于英国的“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统计的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至2012年9月数据)^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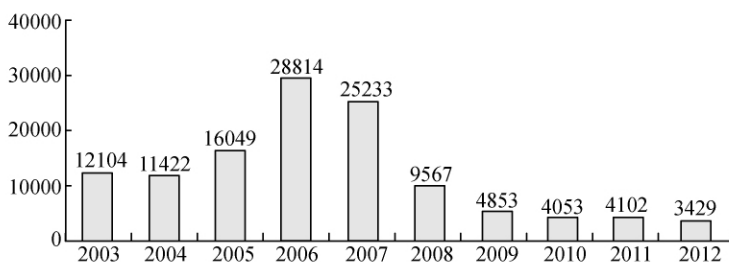


图-2 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变化(人/年)

据网站“iCasualties.org”的统计数据,2007年5月时驻伊拉克联军死亡人数达到最高峰,当月为131人。而到该年的12月,联军当月死亡人数下降到25人。从2008年年初到2011年年底,驻伊联军平均每月的死亡人数为12人。伊拉克每月的平民

① <http://www.icasualties.org/Iraq/index.aspx>, 2012-11-7.

② Documented Civilian Deaths from Violence, <http://www.iraqbodycount.org/database/>.

死亡人数也从 2007 年 5 月时的 1700 多人下降到该年 12 月的 470 多人。2008 年 6 月到 2011 年 6 月期间,平民死亡人数平均每月约为 200 人,这仅相当于 2006 年下半年每月死亡人数的 1/10。^① 2007 年 9 月上旬,彼得雷乌斯将军作为美国驻伊拉克军队指挥官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详述了伊拉克“反叛乱”战略取得的效果。^②

虽然存在着统计口径的差异,驻伊军队和平民的伤亡人数总体上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似乎说明了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略实施的效果。但问题是:这些军队和平民伤亡的下降是“反叛乱”战略的成效,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由此涉及对“反叛乱”战略作用的根本看法。

美国一些共和党人以及军方倾向于支持“反叛乱”战略的作用,尤其是增兵战略的作用。他们认为,更多的军队以及各种不同方法的采用,遏制了“叛乱”活动并摧毁了其杀死美国人或伊拉克人的能力,从而减少了暴力。^③ 其实,“增兵”一度被认为是经典的战略案例,后来美军在阿富汗也实施了类似的战略。^④ 英军吸取美增兵战略的经验,在其 2009 年 10 月发布的新的陆军战场手册《反叛乱》中有所体现,其他北约成员国也有类似的考虑。^⑤

但存在着不同的一种认识,认为伊拉克“叛乱”形势的好转其实与美国实行的“反叛乱”战略无关,而与伊拉克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的斗争形势有关。如英美两位“反叛乱”专家丹尼尔·马斯腾和卡特·马尔卡西安指出,2006 年发生的最有希望的事情是在安巴尔省出现某些反对伊拉克基地组织的逊尼派部落,即“安巴尔觉醒”,而这与美国的“反叛乱”战略战术无甚关联。其证据是,在“安巴尔觉醒”前,实际上自从 2004 年以后,美军在伊拉克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依据“反叛乱”战略的行动,如主要依靠伊拉克警察部队执行搜寻“叛乱”分子的“间接方法”,或由大规模美军部队执行“清除—控制—建设”的方法,或者派出特种行动小组和采取联合行动项目等,其结果要么是伊拉克警察部队的溃散,要么是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反叛乱”行动均

① 数据引自: <http://iCasualties.org/Iraq/index.aspx> 2013 年 3 月 12 日登录。

②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等对伊拉克的伤亡数据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 Iraq Index: Tracking Variables of Reconstruction & Security in Iraq, July 2012, <http://www.brookings.edu/iraqindex>。维基百科网站对伊拉克战争中的伤亡问题作了值得参考的概述,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sualties_of_the_Iraq_War 2013 年 3 月 12 日登录。

③ See Kimberly Kagan, *The Surge: A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9; John McCain and Joe Lieberman, “The Surge Work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0, 2008; Max Boot, “The Truth about Iraq’s Casualty Cou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 2008; James R. Crider, “A View from Inside the Surge”, *Military Review*, Vol. 89, No. 2, March/April 2009, pp. 81—88; Craig A. Collier, “Now That We’re Leaving Iraq, What Did We Learn?”, *Military Review*, Vol. 9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0, pp. 88—93; Bartle Bull, “Mission Accomplished”, *Prospect*, October 27, 2007; Dale Andrade, *Surging South of Baghdad: The 3rd Infantry Division and Task Force Marne in Iraq, 2007—2008*, Washington, D. C.: U. 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10.

④ 2009 年美国将阿富汗美军增加到近 10 万人。这使坎大哈和赫尔曼丹省的安全状况大大改善,并使阿富汗的警察和陆军士兵人数翻倍。See Carter Malkasian and J. Kael Weston, “War Downsized: How to Accomplish More With Les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ch/April 2012, pp. 111—120.

⑤ See Stephen Biddle, et al., “Testing the Surge: Why Did Violence Decline in Iraq in 2007?”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1, Summer 2012, pp. 7—40.

未取得成效。而安巴尔省之所以出现逊尼派部落的“觉醒”,是因为伊拉克基地组织占据了当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资源,迫使原来曾经是“叛乱”分子的这些逊尼派部落发生转变。^①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在美军增兵以前,有逊尼派部落也曾试图反对伊拉克基地组织,但并未取得成功,因为单是这些逊尼派部落的“觉醒”尚不足以抵抗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武装攻击。只有当美军增加的兵力使那些逊尼派“觉醒”部落得到支援,反对伊拉克基地组织的“觉醒”行动才能取得成功。但如果过于强调“反叛乱”战略的作用,则无法对之前“反叛乱”行动的失效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更具客观性的结论是,“增兵”尽管必要,但并不必然导致暴力活动的降低,实际上是“增兵”、使用相关“反叛乱”战略战术手段以及逊尼派的“觉醒”相互结合,最终造就了2007年伊拉克“叛乱”暴力的大幅减弱。^②

值得指出的是,对安全状况的评判还必须考虑到伊拉克安全基础是否脆弱,尤其是美军根据《美伊安全协议》在2012年底全部撤出伊拉克之后伊拉克的安全状况。从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来看,在2009年美军开始退出伊拉克城镇之后,伊拉克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但是,仍不时发生暴力事件,平民死亡人数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且,有些年份还会出现反复。从2012年迄至9月份的数据来看,伊拉克的安全状况仍然存在恶化的可能。从伊拉克国内政治秩序来看,马利基领导的政府被认为充斥着腐败和暴虐的行为,并且存在着利用安全部队和民兵武装组织去压制异己和威吓民众的现象。在社会生活方面,伊拉克国家仍然缺乏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电力、清洁的饮用水、适当的卫生保健。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30%。而且,族裔、宗派、党派之间斗争的加剧,还使这个国家存在着分裂和发生内战的危险。^③

这些情况说明,“反叛乱”战略的效用需要结合具体形势做进一步的界定。美国所施行的“反叛乱”战略在重建伊拉克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需要结合特定的形势来综合评判其效果。事实上,也只有特定的条件下,通过合理的战术战法和正确的力量使用途径,“反叛乱”战略在对付“叛乱”分子方面才有可能起到期望的效果。而这一特定的条件尤涉及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是所谓的“反叛乱”方能否将“叛乱”分子与大多数民众相隔离。也就是说,

① Daniel Marston and Carter Malkasian, eds., *Counterinsurgency in Modern Warfare*, p. 257. See also Austin Long, “The Anbar Awakening”, *Survival*, Vol. 50, No. 2, April/May 2008, pp. 67—94; Steven Simon, “The Price of the Surg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e 2008, pp. 57—76; Jim Michaels, *A Chance in Hell: The Men Who Triumphed Over Iraq's Deadliest City and Turned the Tide of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2010; Daniel R. Green, “The Fallujah Awakening: A Case Study in Counter-Insurgency”,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Vol. 21, No. 4, December 2010, pp. 591—609; Dick Couch, *The Sheriff of Ramadi: Navy SEALs and the Winning of Anba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② Stephen Biddle, et al., “Testing the Surge: Why Did Violence Decline in Iraq in 2007?”

③ 对美军2012年底撤离后伊拉克形势的悲观预计,见 Ned Parker, “The Iraq We Left Behind: Welcome to the World's Next Failed Stat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ch/April 2012, pp. 94—110.

“反叛乱”战略对付的“叛乱”必须是为当地民众所反对的力量,必须使当地民众能够真正地凝聚安全上的共识,从而自觉地对其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而考虑到美国推翻萨达姆后伊拉克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安全混乱局面,伊拉克各种族裔、宗教和派系的根深蒂固的矛盾以及实际上的武装割据局面,毫无疑问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全民性共识。其实,美军在 2004 年以后即开始强调发展伊拉克国民卫队和其他当地军队,但重建这些安全部队主要依赖库尔德民兵或什叶派民兵。逊尼派民众常常对所谓的“叛乱”组织持同情态度,无意与其同胞部落或家庭成员进行战斗。后来 2007 年美国在安巴尔省等地区实施的“反叛乱”战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当地逊尼派部落对伊拉克基地组织以及外国恐怖分子在当地的武装割据越来越难以容忍。恐怖组织在当地占用了普通民众的经济社会资源,对不服从的部落民众进行残酷打压,并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实行严格的原教旨主义宗教统治。正是这种极端行为,激起了当地世俗化程度较高的逊尼派社会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组织有效的兵力介入,对当地恐怖组织施以打击,保证当地民众的安全,才赢得了当地逊尼派部落的支持与合作。在美军大规模增加兵力的情况下,美军压使什叶派和逊尼派达成和解,这使“安巴尔觉醒”的示范效应得以扩散至伊拉克其他地区。而美军也逐步认识到自身在伊拉克存在合法性上的一些根本困境,对普通民众及其民兵武装组织与恐怖组织予以区别对待,不断采取措施以赢得当地民众的“民心”,从而保证了“增兵”战略的效果。但是,在美军完全撤出以后,缺少了外部强力施压这个最大的诱因,以及基地恐怖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削弱,伊拉克内部的各种矛盾便日益突出,甚至在伊拉克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内部也陷入了纷争。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人在国内安全上自然不可能达成共识。

二是“反叛乱”方是否有决心进行持续的大规模投入准备,以应对“反叛乱”战略多重手段对资源的极大需求。“反叛乱”战略需要投入大规模的兵力和开支。加鲁拉曾经形容“反叛乱”战争是“狮子与苍蝇的战争”,这足以形象地说明“反叛乱”与“叛乱”之间的极其不对称。据估计,“反叛乱”方所需花费是“叛乱分子”的 10 倍到 20 倍,甚至更高。^①但是,这种大规模投入型战争并不符合美国决策者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长远思考。在战争决策过程中,拉姆斯菲尔德及其文职高官们坚持打一场成本低廉的伊拉克战争。^②事实上,包括中情局、国务院和美国陆军的各项计划研究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即援助战后的伊拉克将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大量的美国军队,成本也将非常高昂。但这些看法都未被采纳。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顽固地认

① David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pp. 3—7.

② 拉姆斯菲尔德拒绝听取军方的意见,抛弃了军方在伊战前已经形成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曾要求派遣 25 万人的部队。他坚持整个行动只需更小规模的部队,约 8 万人的部队在空中火力支持下便可完成。在随后制订新计划的过程中,他同意对其小兵力政策予以调整,但最后入侵伊拉克的部队也只是 14 万人。Alistair Finlan, “Trapped in Dead Ground: U. S.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in Iraq”,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Vol. 16, No. 1, March 2005, pp. 1—21; W. Shane Story, “Transformation or Troop Strength? Early Accounts of the Invasion of Iraq”, *Army History*, Winter 2006, pp. 21—29.

为,对伊作战将是一种成本低廉的又快又简单的任务。^①其结果是在2001年到2006年间,美军以60年来最小的兵力规模打了两场战争,很明显当时美国军队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因规模太小而难以承担分派的地面作战任务。^②

当然,拉姆斯菲尔德等强调小型兵力的用兵思想本身并没有错,错在美国不自量力地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倡导对美军进行战略转型。这种主张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转型趋势相适应,甚至与70年代的全志愿部队的概念相适应。这种转型思想强调综合性地运用优势技术实现对战场的全面感知,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而越来越少强调所投入兵力的数量和规模。这种军事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小布什总统的主张。早在1999年,小布什在南卡罗来纳军事学院发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演说中便强调,军队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机动性和速度,而非数量和规模。“我们的军队必须机动灵活、火力强大、部署迅速并且将所需的后勤保障降至最低水平。”“重装部队必须更加轻型化,而轻装部队则必须更具杀伤力。所有部队必须更易部署、组织规模更小、编队更机动灵活,而不是笨重的师级编制。”拉姆斯菲尔德就任国防部长后,正是按照这种思路对美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转型改造。其具体的理论指导之一是所谓“网络中心战”概念,即强调建立网络化的系统,以便各级决策者能够更准确地选择目标以及打击目标所使用的武器,有利于更快地对目标实施打击。^③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等一再强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证明了“新的美国式战争”的正确性,并坚持他们的军事转型计划。^④正是在这样一种用兵思想的指导下,美国错误地设计了一场在伊拉克的战争,在政治、战略和军事上均错误地预计这场战争会很快结束。但事与愿违,却出现了久拖不决的军事局面,完全不符合拉姆斯菲尔德他们的预想。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经典的“反叛乱”战略原则被重新提出并为彼得雷乌斯等军中将领导支持和实践,但它并未被确立为伊拉克战场的主导性战略。在本质上,“反叛乱”战略对大规模兵力和投入的要求根本不符合拉姆斯菲尔德主导的转型思想。在拉姆斯菲尔德2006年去职以后,作为“反叛乱”战略倡导者的彼得雷乌斯被任命为驻伊联军指挥官。然而,走上“转型”之路的美国军队已经难以应对“反叛乱”战略的要求。美军不可能派出大规模的部队,而且金融危机的打击,日益捉襟见肘的财力,美国也不可能支付巨大的战争开支。

鉴于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略在以上两个方面均存在先天缺陷,或有难以根

① James S. Corum, *Bad Strategies*, p. 202.

② *Ibid.*, pp. 196—197.

③ Frederick W. Kagan, *Finding the Targ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ilitary Policy*,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6, pp. 254—286.

④ *Ibid.*, pp. 287—288.

本改善的困境,因此,不管美国在伊拉克以公开还是隐形的方式存在,^①其“反叛乱”战略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实际上,“反叛乱”战争所具有的极高政治属性说明,“反叛乱”战略具有统领政治—军事全局的内在要求。然而,即使不说越南战争的历史教训不允许美军再次卷入那种持久的大规模外部干涉行动,当代经历了信息化转型的美军也不可能在政治—军事全局上进行这种成本高昂、大规模、持久性的“反叛乱”战争。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行动也并不想在政治—军事全局上完全按照经典“反叛乱”战略的要求行事,只是希望吸纳“反叛乱”战略仅在军事层面存在的某些效用,即策略性地诉诸“反叛乱”行动,而在总体上必须将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限定在其可以承受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美国决策者后期在 2007—2008 年推行的“增兵”战略可说是这种策略性使用“反叛乱”行动的典型例证,因为这次“增兵”行动具有事先明确界定的军事政治条件和时间空间条件,即必须尽快从伊拉克撤出美国军队。由此美国在伊拉克实施的“反叛乱”战略也就注定只能取得暂时性的效果。迫于在国内面临普遍反战和极大资源制约,而不得不将其军队相继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撤出等现实条件,美国最终不得不停止那种本质上要求高昂成本的“反叛乱”战略,而执行一种新的廉价的反恐怖战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无人机轰炸为标志的新战略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正式出台。^②

① 至 2011 年底,美国移交了在伊拉克的所有军事基地,但仍以隐性方式维持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据统计,美在伊各类军事与安全人员约在 1.5 万到 3 万人之间。一是私人保安力量。其中有许多是刚脱下军装的美国军人。至 2012 年 1 月 29 日,美国在伊私人专业保安在 5000 人左右。二是使馆安全与情报人员。美国在巴格达的使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使馆,拥有 1.7 万名工作人员。另外美国在巴士拉、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等地设有领馆,每个领馆拥有 1000 名左右工作人员。三是军事培训人员与军事顾问。美国在伊拉克拥有数百名军事教官。四是特种空军力量。除国防部和中情局在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秘密部署“捕食者”、“死神”等大型作战无人机外,美国国务院还在伊部署了 20 多架小型无人机,用于情报搜集、通信、保障外交人员安全等任务。参见孙德刚《美国在伊拉克军事部署的调整:从刚性基地到柔性存在》,《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2 期,第 55—66 页。

② 有分析将奥巴马的这种新战略理论称为“浅痕”理论,即注重通过无人机轰炸、网络战、特种部队作战和“幕后指挥”的策略来代替在战场上部署大批常规军事力量的做法。新华社《鲁斯兰撰文分析奥巴马“浅痕”军事理论的实践与影响》,《参考资料》2012 年 11 月 8 日。